

· 农业经济 ·

# 相对贫困阶段农村贫困居民脱贫增收研究

——基于本地和域外社会网络视角

杜江, 王泽宇, 解天骄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36)

**摘要:** 进入小康社会, 相对贫困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 促进农村贫困居民持续增收是巩固扶贫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为研究本地和域外两种社会网络在扶贫动态进程中的增收影响变化, 本文利用云南云县农村贫困居民调研数据, 运用系统 GMM 模型分析了本地和域外两种社会网络特征对农村贫困居民增收的异质性影响, 结果发现本地社会网络增收作用具有明显的溢出性, 而域外社会网络增收作用具有明显的流动性, 且不同收入阶段两种社会网络的增收作用具有差异性。基于此, 建议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提供更多公共品, 构筑农村社会网络; 并鼓励社会参与乡村建设和村民自治, 打通两类社会网络的增收渠道; 还要注重保障性扶贫与开发式扶贫有序衔接, 持续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关键词:** 农村贫困居民; 收入增长; 扶贫减贫; 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嵌入理论

**中图分类号:** F83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X(2020)08-0074-10

##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020年, 我国将取得脱贫攻坚决胜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绝对贫困将被历史性解决, 但相对贫困仍会持续存在, 并成为“后小康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 是下一步扶贫减贫开发的工作重心。与脱贫攻坚取得的卓著成效相比, 我们对脱贫可持续性关注不足。精准脱贫旨在提高脱贫质量, 保证贫困人口持续增收, 巩固扶贫减贫成果。“农业农村工作, 说一千道一万, 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要加快构建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的畅销政策机制, 让广大农民都尽快富裕起来”。<sup>①</sup> 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 将提高人民收入水平作为逐步实现全

<sup>①</sup> 2018年6月12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考察时的讲话。

收稿日期: 2020-06-2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制度安排和推进路径”(18VBN015)

作者简介: 杜江(1986-), 男, 山东济南人, 助理研究员, 博士, 主要从事教育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财政学等方面的研究。

E-mail: dujiang@cass.org.cn

王泽宇(1982-), 男, 天津人, 副研究员, 博士, 主要从事战略管理研究。E-mail: wangzeyu@cass.org.cn

解天骄(1986-), 女, 云南昭通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E-mail: jietianj@cass.org.cn

体人民共同富裕时代目标的重要内容。因此,解决“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村贫困居民增收问题,作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突破口和结构性改善的基本出发点,应得到扶贫可持续研究和政策实践的重视。

过去一个时期,扶贫减贫主要依靠加大“三农”扶持力度,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和加速科技进步转化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增收。但预计脱贫攻坚收尾期及以后,政策支持、技术进步及相关农业改革的刺激增收效果开始逐步减弱,探索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突破口,成为农村发展与扶贫减贫研究的重要议题。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城乡二元结构虽得到缓解,但囿于户籍、土地等政策性原因,城乡二元结构仍难以打破<sup>[1]</sup>,并且伴随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衍生出新的社会网络,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呈现出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可能长期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加。

以农村结构新变化为突破口,推动农村扶贫减贫特别是贫困居民收入增长,是本文的研究缘起。新经济社会学认为,嵌入形成了社会网络,社会网络中能够被利用产生效益的资源即是社会资本。因此,行为人所嵌入的社会网络是其职业发展、收入增长和资源获取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网络的规模、强度和成员特征是发挥网络外部性的重要基础<sup>[2]</sup>。不同的社会网络条件对应着差异化的社会资本和信息不对称状态,农村居民中普遍存在差异化的社会网络条件<sup>[3]</sup>,而这种差异化可以通过影响农村居民的家庭融资能力、信息获取能力、非农收入机会和政策红利分配等间接影响收入<sup>[4-5]</sup>。所以,在农村贫困居民增收过程中,拓展和提升社会网络条件将为其提供重要社会资本。

农村地区社会网络可细分为本地和域外两部分,前者指农村居民在其居住地长期稳定嵌入的社会网络,其成员基本为本地居民;后者指居民通过结识外地人员、流动性交往等方式嵌入的社会网络,其成员多为域外人员。现实中两类社会网络本属一体,互为融合、不可分割。但所属成员的学历、收入、阅历、经验、成员规模和连接强度均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可能在农村脱贫减贫特别是贫困居民增收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嵌入是一种经济社会生活的基础常态,社会网络是对嵌入结果的概念化抽象,而社会资本又是对社会网络的工具化抽象。社会资本理论认为,行为人从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中获得能够产生效益的资源或规制就是社会资本。因此,社会网络也不可避免地对嵌入其中的行为人及其经济社会行为产生影响。Ruef<sup>[6]</sup>研究发现,行为人若能嵌入条件更好的社会网络,会对其职业发展和工作绩效产生正向影响,而且社会网络中的弱连接能够帮助行为人更多获取有效信息和资源,进而引发高质量的经济社会行为。Walker等<sup>[7]</sup>则关注社会网络规模的相关研究,发现行为人所嵌入社会网络的规模,能影响其从中获取信息和资源的能力,从而改变行为人的工作和收入境况。关于微观层面的社会网络形成,刘刚等<sup>[8]</sup>认为,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行为人,往往在年龄、地域等人口特征,职业、教育和收入等经济社会特征方面具有一定相似性,不同类型社会网络的成员对所属网络产生的绩效贡献差异很大。边燕杰<sup>[9]</sup>也认为,行为人的地理、人口特征,不仅能左右主体社会网络的形成,还能够影响社会网络的外部性效果。近年来,嵌入理论开始关注在不同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下形成的社会网络,及它们表现出社会网络外部性的异质性<sup>[10]</sup>。但现有研究还未能对不同社会网络特征属性所导致的差异化溢出效应及内在机制进行有效实证检验和详细理论分析。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更为复杂,特别是农村传统社会网络发生了差异化发展<sup>[11]</sup>:一方面,农村本地社会网络基于世俗血缘关系依然发挥着重要嵌入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扶贫开发、农村劳动力流动等原因,农村居民正以不同以往的方式与外界社会互联,逐步形成农村域外社会网络。

综上所述,现实中两类社会网络若具有不同的成员规模、连接强度和成员背景等特征,就可能对农村贫困居民增收产生异质性影响。两类社会网络相关特征对农村贫困居民的增收影响孰轻孰重,在收入水平动态变化中,两类社会网络的增收影响又是怎样,回应这些问题不仅能完善现有社会网络分析框架,而且对于识别社会网络在促进农村贫困居民增收中的关键作用,捕捉不同扶贫阶段社会网络增收作用的动态焦点都十分重要。但现有社会网络理论未对两种社会网络的存在演进和互动运行进行系统分析,既往研究中也未有通过定性、定量的方法研究两者异质性以及增收效应的异质性问题。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在理论发展层面,首次在农村经济社会生活中,证明了农村居民在社会网

络嵌入过程中会因社会网络成员所处的区位环境的不同(城市/乡村不同区位),导致差异化的嵌入效果,即从理论上证明了社会网络嵌入存在异质性。第二,在理论适用场景上,首次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不对称性影响引入社会网络嵌入理论研究中,分析了两类不同社会网络对农村贫困居民收入的差异化影响,拓展了理论的应用场景。而且扶贫减贫是动态经济问题,使用社会网络理论对这一经济社会议题进行理论探讨,延展了社会嵌入理论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解释力,发展了农村两类社会网络异质性影响的研究领域。第三,在政策实践层面,丰富了对扶贫减贫实践客观规律的认识,社会网络作为社会工具能够有效减贫增收,且本地和域外两类社会网络在减贫增收过程中存在异质性,但这种异质性并非优劣性,而是在不同情景、不同阶段下的适用性、有效性。

## 二、研究假设

### (一) 社会网络相关特征对农村贫困居民的增收影响

基于社会嵌入理论视角,社会网络影响行为人收入的过程存在三个途径:一是通过扩大社会网络的规模提升嵌入的收入效应;二是通过强化社会网络发挥的增收效应进而影响收入;三是通过特定的行为人特征影响相关社会网络水平进而影响收入。一方面,域内社会网络的基础是信任制的熟人社会,其收入效应的发挥更多地是依靠强关系行为,即域内社会网络成员在寻找可利用的信息或资源时更倾向于自己的熟人和亲友等强关系。因此,社会网络的连接强度在熟人社会经济交往过程中能发挥更强的增收效应<sup>[12-13]</sup>。另一方面,域外社会网络的主体则是偏自由化、市场化的生人社会,其强调人员覆盖的广度而非交往的深度,多数成员之间的连接依靠弱关系,但正由于这种规模性的网络特征,域外社会网络中多数存在的弱关系可能达成少数强关系所难以达到的增收和创富效果。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 与本地社会网络相比,域外社会网络规模更能提升农村贫困居民收入水平。

**H2:** 与域外社会网络相比,本地社会网络强度更能提升农村贫困居民收入水平。

我国地方行政层级设置虽几经变化,但基本保持“省—县(市)—乡(镇)”格局,农村地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设有乡镇基层政权,这意味着亲缘驱动的社会网络和政令驱动的行政体制在农村融合共存。但农村传统观念重,市场开放程度低,对行政权力的依赖更强烈,亲缘社会网络偏重世俗交往,而行政体制衍生出的政治关联更务实功利,也更能影响农村经济社会生活<sup>[14]</sup>。政治关联可分组织化、个人化两类,前者代表集体性的行政管理网络,后者可视因个人权力影响形成的社会网络,由于乡镇政府责任大、权力小的施政状态,农村自治组织又一直受到地方行政权力制约,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化政治关联产生的经济效益往往比组织化政治关联高。另一方面,县官不如现管,本地社会网络中的行政官员,可能直接参与扶贫政策的执行和帮扶管理,其职务的溢出效应会比域外社会网络中类似甚至更高级别的官员更明显。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3:** 与域外社会网络相比,本地社会网络成员具有行政职务更能提升农村贫困居民收入水平。

高收入群体拥有更开放多样的视野、更好的教育背景和更强的创新能力,即收入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应水平的社会地位、认知水平、知识储备和商业经验。高收入的社会网络成员,可以通过交易消费、技术共享和商业合作等方式表现出明显的收入溢出效应<sup>[15]</sup>。在农村地区,虽然域外社会网络成员的收入水平相对更高,但本地社会网络成员与贫困居民在地理、心理上更为靠近,更了解他们的致贫原因和实际需要,帮扶接济行为更有针对性,收入水平带来的溢出效应也更明显。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4:** 与域外社会网络相比,本地社会网络成员的收入水平更能提升农村贫困居民收入水平。

由教育背景与社会嵌入关系密切可见,个体受教育水平能正向影响社会认知,从而能帮助其有效识别具体问题,分析比较潜在方案、预测未来机会与挑战,进而作出准确决策判断。不仅如此,当个体嵌入社会网络时,受教育程度不仅能提升自身收益,还可以通过互动产生信息集聚效应,对其他成员的知识技能起到辐射作用,特别是在信息相对封闭、技能相对落后的农业地区,这种拉动作用更为强烈<sup>[16]</sup>。农业地区的外来人口往往掌握更多更新的职业技能或商业信息,其受教育程度作为分析使用这些资源的必要条件,对本地居民收入能够起到促进作用。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5:** 与本地社会网络相比,域外社会网络成员的学历更能提升农村贫困居民收入水平。

商业行为和经验是一种经验性能力,不仅能提高自身收入,还对地区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因为拥有丰富商业经验的社会网络成员,习惯将工商业实践中的重要洞见应用于社会网络中的商业交往和创富活动之中,进而提高集体经济收益<sup>[17]</sup>。由于农村工商业发展较为落后,留在本地的社会网络成员的商业行为和经验,作为当地经济固有组成部分,对于本地社会网络成员的收入水平更多是起维持性作用,缺少增量性和外部性的作用。反之,域外社会网络成员的商业行为和经验,往往是在城市或相对开放市场环境中形成的,能有效转化为信息、技术和其他资源帮助本地居民增收。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6:** 与本地社会网络相比,域外社会网络成员的商业经验更能提升农村贫困居民收入。

## (二) 两类社会网络的增收作用与不同收入阶段的对应关系

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同阶段,经济工作重心会随之转换。扶贫减贫作为动态经济问题也是如此,农村贫困居民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扶贫效果,表示扶贫进程当前处于何种阶段。关注农村社会网络的增收效应如何随收入水平动态变化,对于提升扶贫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十分重要。Davidson和Sanyal<sup>[18]</sup>研究表明,针对贫困居民的增收刺激具有边际递减的趋势,如社会救助政策对贫困群体的增收刺激会随收入提升而逐渐减弱。在消除贫困的最后阶段,单纯依靠前期政策刺激、福利救助和利用内部性社会资源持续增收的难度变大,特别是进入贫困临界阶段,收入水平趋于稳定,外部性的信息、技术和资本的收入刺激更加明显。在我国扶贫减贫的动态进程中,农村两类社会网络的增收作用与不同扶贫阶段可能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7a:** 农村贫困居民收入越低,本地社会网络规模的增收作用越强。

**H7b:** 农村贫困居民收入越低,本地社会网络强度的增收作用越强。

**H8a:** 农村贫困居民收入越高,域外社会网络规模的增收作用越强。

**H8b:** 农村贫困居民收入越高,域外社会网络强度的增收作用越强。

## 三、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

### (一) 数据说明

研究中涉及社会网络和农村居民人口特征,一般采用二手数据与调研数据相结合方法。对于与社会网络相关的农村居民心理、认知等主观数据采用问卷调研,并检验数据信度和效度;对于农村居民收入、年龄、职业和学历等客观数据,虽然也利用问卷调研,但无需多个问项和多重检验便可完成信度检验,故问卷仅针对每个问题设置一个问项,并比照银行账单、扶贫金发放表、户籍登记和学历证明等进行可信性确认<sup>[4]</sup>。

农村问题与扶贫问题在研究方法上有一定相似性,都习惯以小见大,从地区经验推广整体实践,费孝通<sup>[19]</sup>从地区性问题、案例和数据出发,长期跟踪,通过理论分析归纳总结为普遍性的结论,进而以政策形式指导实践。国际反贫困研究中,地区案例研究方法对减贫实验和政策探索表现出极强的适用性,有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的案例地区一般具有某些指向性特征<sup>[20]</sup>:第一,贫困代表性,被研究地区的人均收入低、文化和健康水平落后、公共服务严重不足等贫困情况需符合整体贫困特征。第二,存在致贫因素,被研究地区的虹吸效应、地区常见疾病或自然交通等致贫原因需具有独特性。第三,减贫进程可追溯,被研究地区减贫过程能被记录追踪,即可获得过程性案例、数据等研究素材。

本文选择云南云县<sup>①</sup>为研究地区,一是因为云南属于“三区三州”,<sup>②</sup>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其不同时期内的贫困人口数、人均收入水平和贫困县村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同时云南扶贫减贫成效也十分显著,2015—2019年,年均减贫120万人以上,贫困发生率从17.1%下降至1.3%,贫困村出列率为94.7%,贫困县摘帽率为54.5%。二是云县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主要依

① 云县下辖的7个镇、5个乡和2个农场:爱华镇、漫湾镇、大朝山西镇、涌宝镇、茂兰镇、幸福镇、大寨镇;忙怀彝族布朗族乡、晓街乡、茶房乡、栗树彝族傣族乡、后箐彝族乡;幸福农场和新城农场。

② “三区”是指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四省藏区及南疆的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四地区;三区三州的“三州”是指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和甘肃临夏州。

靠农业、旅游业,经济结构单一,劳动人口以净流出为主,而且云南各辖市(州)的经济发展情况呈倒金字塔型,昆明一市独大,存在明显的城市虹吸效应,加之多民族地区语言文化、历史风俗迥异,这些都是云县致贫的可能原因。但从农村社会网络和社会流动角度看,这些原因也恰恰促使云县本地与域外社会网络的规模、强度和成员特征形成明显差异,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现实研究基础。三是云县在本研究数据采集期内实现了贫困县摘帽,刚好在数据层面模拟了类似自然实验的效果,比照全国与云县在贫困基础、脱贫成效和返贫情况等7项数据指标,<sup>①</sup>发现云县整体贫困缓解明显,但政策脱贫、临时脱贫的情况客观存在,能够较好代表全国农村贫困居民整体脱贫态势;而且云县建立了独有的农村贫困居民下沉统计制度,保证了贫困居民统计数据全面、长期和有效。笔者于2016年向云县的12个乡镇发放问卷共1800份(每个乡镇150份),回收有效问卷943份;2018年10月对首次受访人进行二次回访,其中返回有效问卷595份;2019年调研再次追访,收回有效问卷371份。经过三次调研访问,共收集1909个观测值,形成2017—2019年三期云县农村贫困居民社会网络相关数据库。

## (二) 变量选取

### 1. 被解释变量

借鉴马光荣和杨恩艳<sup>[4]</sup>的做法,构造农村贫困家庭收入变量作为衡量农村贫困程度的代理变量,用农户月度家庭总收入表示,选取调研对象是政府划定的农村贫困农户,因此,贫困居民收入越低,则贫困程度越高;反之,亦然。为降低数据偏误,对收集的收入数据以千元为单位进行处理。另外,为有效利用系统GMM模型,额外收集农户家庭上一年收入水平数据作为隐变量。

### 2. 解释变量

构造社会网络相关特征变量。首先,对于社会网络规模和社会网络强度,社会学研究普遍使用问卷测量。其中,社会网络规模一般由被访人估计所在社会网络中的成员数量代替;社会网络强度则从亲密程度、关系长度和互动频率三个维度<sup>②</sup>进行测度,然后对问题评分取均值作为代替<sup>[21]</sup>。因此,参考上述研究,分别对本地社会网络规模和强度、域外社会网络规模和强度两组概念进行操作化定义和测度,并且对社会网络强度中的三个问项两两计算相关系数和统计P值,均通过效度检验。其次,构造社会网络成员的行政职务、学历水平、商业经验和平均收入四个变量,借鉴Brüderl和Preisendörfer<sup>[22]</sup>的数据处理方法<sup>[22]</sup>,分别询问受访者所处本地、域外两类社会网络中成员的公职人员(公务员或者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数量,用上述两个数值除以对应的社会网络成员规模(数量),即生成本地和域外社会网络成员行政职务变量。社会网络成员学历水平变量和商业经验变量以相同方法处理得到,其中学历水平变量为所在社会网络成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成员数量占比,商业经验变量为所在社会网络成员中有从商经历的成员(个体经商或开办公司)数量占比。另外,通过询问受访者平均收入,生成本地和域外社会网络成员平均收入变量。两类社会网络的特征属性变量中,除行政职务变量外,其余变量均在本地和域外组间呈现明显差异,说明农村地区的本地和域外社会网络具有明显不同。

### 3. 控制变量

影响农户家庭收入水平的因素很多,研究发现,农户家庭从事工商业会显著提高其收入水平<sup>[4]</sup>;同时,农户家庭的年龄结构、性别组成和学历水平<sup>③</sup>等人口变量也会影响其收入水平和贫困情况;另外,家庭拥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能力,即家庭承包或分配的土地数量(亩数)、有劳动能力家庭成员人数和外出务工人数,都会影响农户收入和贫困情况。因此,为控制其他因素对农户收入和贫困的影

① 对比的数据指标包括:识别出建档立卡贫困村数占比、贫困户数占比、贫困人口数占比;贫困发生率、贫困村出列率、贫困县摘帽率;脱贫返贫率。

② 亲密程度:你与人际关系成员亲密程度如何?1分为极不亲密,2分为不亲密,3分为一般,4分为较亲密,5分为极为亲密;关系长度:你与人际关系成员平均认识多久?1分为不到1年,2分为1—3年,3分为4—6年,4分为7—9年,5分为10年以上;互动频率:你与人际关系成员平均多久交流一次?1分为1年不到1次,2分为1年数次,3分为1个月1次,4分为1周1次,5分为每天都会交流。

③ 学历水平使用虚拟变量衡量农户家庭成员的学历情况,以家庭中是否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成员为标准,有为1,否则为0。

响，本文在调研问卷中对上述诸类问题进行了询问并生成控制变量。另外，还控制了家庭重疾成员、乡镇和时间三个虚拟变量。

各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 量	含 义 ( 单位)	观测值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庭收入	月度家庭总收入 ( 千元)	1 909	1. 733	0. 695	0. 155	8. 000
本地规模	本地社会网络规模 ( 个)	1 909	17. 796	6. 907	3. 000	58. 000
域外规模	域外社会网络规模 ( 个)	1 909	5. 337	2. 096	2. 000	48. 000
本地强度	本地社会网络强度	1 909	0. 451	0. 591	0. 000	6. 800
域外强度	域外社会网络强度	1 909	0. 214	0. 235	0. 000	5. 000
本地行政职务	本地社会网络成员行政职务	1 909	0. 101	0. 133	0	1
域外行政职务	域外社会网络成员行政职务	1 909	0. 122	0. 154	0	1
本地平均收入	本地社会网络成员收入 ( 千元)	1 909	2. 892	1. 209	0. 155	16. 000
域外平均收入	域外社会网络成员收入 ( 千元)	1 909	3. 730	1. 028	1. 500	30. 000
本地学历水平	本地社会网络成员学历水平	1 909	0. 054	0. 023	0. 000	0. 116
域外学历水平	域外社会网络成员学历水平	1 909	0. 119	0. 048	0. 031	0. 333
本地商业经验	本地社会网络成员商业经验	1 909	0. 106	0. 039	0. 000	0. 358
域外商业经验	域外社会网络成员商业经验	1 909	0. 154	0. 095	0. 100	0. 508
家庭工商业	家庭从事工商业虚拟变量	1 909	0. 195	0. 098	0	1
年 龄	农民年龄 ( 岁)	1 909	51. 770	29. 540	29. 000	82. 000
性 别	农民性别虚拟变量	1 909	0. 711	0. 398	0	1
学历水平	家庭成员本科学历虚拟变量	1 909	0. 359	0. 154	0	1
土地数量	家庭拥有土地数量 ( 亩)	1 909	1. 045	1. 339	0. 500	8. 000
家庭劳动人口	家庭有劳动能力人数 ( 人)	1 909	1. 817	0. 679	0. 000	6. 000
家庭外出口	家庭外出务工人员数 ( 人)	1 909	1. 198	0. 773	0. 000	6. 000
家庭重疾成员	家庭重疾成员虚拟变量	1 909	0. 258	0. 119	0	1
乡 镇	乡镇虚拟变量	1 909			0	1
调研时间	时间虚拟变量	1 909			0	1

####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基本回归结果与分析

系统 GMM 模型能够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在扶贫减贫这一动态经济问题上有较强的适用性。本文利用系统 GMM 模型，对 2017—2019 年共 1 909 个观测值进行回归分析，检验本地、域外社会网络的主要特征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首先，以农村贫困居民家庭收入为被解释变量，以农村贫困居民本地和域外两类社会网络的规模、强度、行政职务、平均收入、学历水平、商业经验作为解释变量，控制相关变量后进行回归，对上述变量回归系数进行本地组和域外组的两两比较，并对比较结果进行 Z 检验，以确保结果具有统计显著性，具体如表 2 所示。从表 2 可以看出，在社会网络规模、学历水平和商业经验的收入影响方面，域外社会网络与本地社会网络的影响差异显著为正，证明了 H1、H5 和 H6；在社会网络强度、行政职务和收入水平的收入影响方面，本地社会网络与域外社会网络的影响差异显著为正，证明了 H2、H3 和 H4。上述结果均通过 Z 检验。随后，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所有结果<sup>①</sup>均与系统 GMM 模型结果一致，且回归结果的两两数值比较通过 Z 检验，再次验证了 H1—H6。

① 囿于版面，数据结果未在正文列出，留存备索。

表 2 本地与域外社会网络对农村贫困家庭收入的差异化影响<sup>①</sup>

变 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本地规模		0.001* (0.001)						0.001 (0.003)
域外规模		0.004*** (2.13E-04)						0.002*** (2.06E-04)
规模影响差异		0.003*** (5.708)						0.001*** (3.140)
本地强度			0.013*** (0.002)					0.012*** (0.003)
域外强度			0.005* (0.003)					0.005 (0.004)
强度影响差异			-0.009*** (-3.964)					-0.008*** (-3.789)
本地成员行政职务				0.030*** (0.005)				0.019*** (0.006)
域外成员行政职务				0.007 (0.008)				0.008 (0.012)
职务影响差异				-0.023*** (-7.083)				-0.011*** (-6.308)
本地成员收入水平					0.006** (0.003)			0.006* (0.003)
域外成员收入水平					0.001* (0.001)			0.001 (0.002)
收入影响差异					-0.005*** (-3.399)			-0.005*** (-2.960)
本地成员学历水平						-0.008 (0.021)		-0.008 (0.025)
域外成员学历水平						0.011*** (0.002)		0.010*** (0.003)
学历影响差异						0.019*** (6.506)		0.018*** (5.941)
本地成员商业经验							0.002** (0.001)	0.002** (0.001)
域外成员商业经验							0.006*** (0.001)	0.006*** (0.001)
商业经验影响差异							0.004*** (4.279)	0.004*** (4.033)
控制变量组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Wald $\chi^2$	5 908.170***	5 025.760***	8 646.880***	8 794.840***	7 561.150***	7 704.110***	6 930.280***	9 039.440***
P 值	29.980 (0.876)	27.503 (0.916)	26.386 (0.939)	31.097 (0.812)	25.175 (0.765)	26.330 (0.939)	26.156 (0.939)	29.305 (0.401)
R <sup>2</sup>	1.108 (0.268)	1.228 (0.219)	1.311 (0.190)	0.917 (0.359)	0.617 (0.476)	0.720 (0.451)	0.901 (0.631)	1.314 (0.185)
农户数	803	803	803	803	803	803	803	803
观测值	1 909	1 909	1 909	1 909	1 909	1 909	1 909	1 909

注：对收入影响差异利用 Test 命令进行检验，差异行中括号内为 Z 值，其余行为标准误；\*、\*\*和\*\*\*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下显著，下同。

① 回归中将各个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确保比较结果具有统计特性。控制变量组包括：家庭工商业（虚拟）、年龄、性别、学历水平（虚拟）、土地数量、家庭劳动人口、家庭外出口、乡镇（虚拟）、调研时间（虚拟）、家庭重疾成员（虚拟）等 10 个变量，囿于篇幅不作结果输出，留存备案。

(二) 分组回归结果与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收入阶段中两类社会网络收入影响的差异，利用收入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通过 Z 检验的结果，比较不同收入阶段中两类社会网络收入影响的差异，如果 Z 检验结果具有显著性，并且两组回归系数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则可以确定收入影响的显著差异（回归系数差异和 Z 值在各回归系数下方输出），具体如表 3 所示。从表 3 可以看出，高收入组的本地社会网络规模和强度的系数均低于低收入组的系数，且通过 Z 检验，证明了 H7a 和 H7b；相反，高收入组的域外社会网络规模和强度的系数都高于低收入组的系数，且通过 Z 检验，证明了 H8a 和 H8b。同样，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数据也支持了上述结果。除社会网络规模、强度特征外，对社会网络成员的平均收入、学历水平、行政职务和商业经验等特征进行回归分析，<sup>①</sup> 结果发现，两类社会网络的四个特征在不同收入阶段中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表 3 不同收入阶段两类社会网络对收入的影响

变 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低收入组	高收入组	低收入组	高收入组	低收入组	高收入组
本地规模	0.001 ** (0.001)	1.01E-04 (0.002)			0.002 ** (0.001)	2.32E-04 (0.002)
不同收入阶段本地规模影响差异	-0.001 ** (-1.989)				-0.002 *** (-2.405)	
域外规模	0.003 *** (0.001)	0.006 *** (0.001)			0.003 *** (0.001)	0.006 *** (0.001)
不同收入阶段域外规模影响差异	0.003 *** (2.415)				0.003 *** (2.396)	
本地强度			0.017 *** (0.002)	0.012 ** (0.004)	0.016 *** (0.003)	0.010 ** (0.004)
不同收入阶段本地强度影响差异			-0.005 *** (-3.001)		-0.006 *** (-3.159)	
域外强度			0.004 (0.003)	0.011 *** (0.002)	0.004 (0.003)	0.009 *** (0.003)
不同收入阶段域外强度影响差异			0.007 *** (4.430)		0.005 *** (4.119)	
控制变量组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Wald $\chi^2$	1 040.290 ***	1 204.300 ***	976.980 ***	940.520 ***	1 142.410 ***	1 708.210 ***
P 值	11.251 (1.225)	12.238 (0.940)	9.337 (0.836)	11.407 (1.112)	13.338 (1.365)	8.885 (0.714)
R <sup>2</sup>	1.202 (0.333)	0.969 (0.310)	1.311 (0.190)	0.885 (0.364)	0.712 (0.487)	0.720 (0.451)
农户数	420	435	420	435	420	435
观测值	949	960	949	960	949	960

注：对收入影响差异利用 Z 统计量进行测算，括号内为 Z 值。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结论与讨论

我国扶贫减贫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了智慧。本文运用系统 GMM 模型，采用云南云县调研数据做了如下实证检验：农村社会中的本地和域外社会网络不仅在特征上存在异质性，且两者的诸类特征对农村贫困居民增收作用也具有异质性；另外两者在不同收入阶段对农村贫困居民增收存在异质性影响。

第一，本地社会网络增收作用具有明显的溢出性。本地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增收影响更多依靠成员的交流强度、行政职务和收入水平，上述三个特征的增收效应显著高于域外社会网络中的同类特

<sup>①</sup> 均采用系统 GMM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囿于版面，数据回归结果未在正文列出，留存备案。

征。其中,本地社会网络强度主要是适应了熟人社会强关系的偏好,能够通过强化信任机制和沟通效率进而帮助农民增收,现实农村生活中社会网络强度的保持主要依靠世俗亲缘和日常劳作,而农村合作社、农民文化活动中心等新平台的出现也发挥了积极作用。本地成员行政职务和收入水平同为资本属性具有明显溢出效应,但两者溢出效应的扩散范围具有局限性,域外社会网络相关特性与本地社会网络相比就鞭长莫及了。第二,域外社会网络增收作用具有明显的流动性。域外社会网络的增收影响主要体现在社会网络规模、学历水平和商业经验上,上述三个特征具有明显的流动性,可通过提高信息资源、商业机会获取和转化的可能性进而帮助农村贫困居民增收。一般来说,社会网络规模扩大主要依靠个体社会流动,而学历水平越高的个体其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越大,由于本地社会网络规模相对稳定,且相关信息资源和商业机会呈现封闭性、同质性,与之相比,域外社会网络规模更大,教育背景更高,所提供的信息资源和商业机会密度更高、质量更好,有明显的“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特点。第三,不同收入阶段两类社会网络的增收作用具有差异性。基于收入差异的视角,模拟了扶贫动态进程中本地和域外社会网络对收入的动态影响,发现对正在努力脱贫增收的低收入组群体,本地社会网络(规模、强度)增收作用更重要,而对已接近脱贫或避免返贫的高收入组群体,域外社会网络(规模、强度)更重要。在低收入阶段,绝对贫困更容易被地理、经济和人际关系较近的本地社会网络破解,由于起点低、作用直接便可达到“立竿见影”帮扶效果,但随收入提升,本地社会网络的增收影响开始后劲不足,缺乏为贫困人口提供脱贫“临门一脚”的能力;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相对贫困则需要域外社会网络帮助,因为域外社会网络成员的学历水平、商业经验、平均收入等特征都远高于农村贫困居民和本地社会网络成员,域外社会网络成员提供的信息和商业机会,需要具有一定的收入基础才能发挥增收作用,即随着贫困缓解,域外社会网络增收作用逐步凸显,为脱贫“最后一公里”提供了动力。另外,其他四类社会网络成员特征在不同扶贫阶段中未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影响,说明社会网络规模和强度可能是有别于社会网络成员人力资本特征的本体属性,且规模和强度有可能是成员人力资本特征发挥增收作用的中介变量,在未来研究中需加以关注。

## (二) 政策建议

我国扶贫坚持精准方略,中央和地方探索积累了大量扶贫政策经验,避免“大水漫灌”,提倡“精准滴灌”是这些政策工具的共同特征。

第一,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努力提供更多公共品,构筑高效稳定的农村社会网络。由于农村两类社会网络的相关特性均有显著增收影响,说明了农村社会网络在脱贫减贫中的重要作用,启发我们要积极构筑高效、稳定和有序的农村社会网络,让贫困人口尽可能多地嵌入社会网络,精准发挥本地、域外社会网络的增收作用。第二,鼓励社会参与乡村建设和村民自治,打通两类社会网络的增收路径。基于农村两类社会网络增收路径具有异质性的结论,启发我们在构筑和扩大农村社会网络关系过程中,对于两类社会网络应有差异化的构筑方向和方法,最大限度发挥它们的增收作用。为此,建议动员社会力量,鼓励村民自治,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参与到农村扶贫减贫中来。对本地社会网络来说,成员行政职务、收入水平的增收溢出性明显,建议发展本地社会网络强度和深度,实现成员频繁高效互动。对域外社会网络来说,应注重利用成员教育背景和商业经验带来的信息资源和商业机会,建议促进城市与乡村、不同农村之间要素自由流动,打破农村自治的封闭性传统,构建开放、包容和友好的农村环境,鼓励城市资本、知识和技能下乡,完善扶贫干部、大学生村官制度、做好外出就业、经商人员的联络沟通,吸纳公益组织、商业机构入村帮扶,多措并举扩大社会网络规模和流动,提高信息的传播扩散率和增收转化率。第三,解决后小康社会相对贫困问题,要注重保障性扶贫与开发式扶贫有序衔接。按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问题将在2020年得到解决,同时相对贫困问题也将成为实现小康之后,我国扶贫减贫工作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建议在地区扶贫实践中,分区域、分阶段做好保障性扶贫与开发式扶贫的有序衔接,即在绝对贫困的收入爬坡期,发挥本地社会网络保障性扶贫的增收作用,即政府发挥核心作用和财政扶贫优势,强化五级政府职能,充分调动乡镇政府、村组织和农村合作社等官办组织,目标是让绝对贫困群众快速摆脱困境,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而在相对贫困的收入巩固期,发挥域外社会网络开发式扶贫的增收作用,即广泛调动公益机构、扶贫干部

和扶贫企业等社会资源参与扶贫,目标是让相对贫困群众具备自主脱贫的经济劳动能力,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脱贫致富。保障性扶贫是开发式扶贫的有效补充,是巩固开发式扶贫成果的重要保障,因此,建议精准识别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人口,对绝对贫困占多数的地区,要加强保障性扶贫力度,真正做到“雪中送炭”;而对于相对贫困人口占比高的地区,可积极运用开发性扶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持续挖掘贫困人口劳动潜力,让保障性扶贫适度退出,保证地区脱贫良性可持续。

#### 参考文献:

- [1] 张海鹏. 中国城乡关系演变 70 年:从分割到融合[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3):2-18.
- [2] 杨汝岱,陈斌开,朱诗娥.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的农户民间借贷需求行为研究[J]. 经济研究 2011,(11):116-129.
- [3] Du Y., Park A., Wang S. Migration and Rural Poverty in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5, 33(4): 688-709.
- [4] 马光荣,杨恩艳. 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J]. 经济研究 2011,(3):83-94.
- [5] 徐林,宋程成,王诗宗. 农村基层治理中的多重社会网络[J]. 中国社会科学,2017,(1):25-45.
- [6] Ruef M. Strong Ties, Weak Ties and Islands: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Predictors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2, 11(3): 427-449.
- [7] Walker G., Kogut B., Shan W. Social Capital, Structural Holes and the Formation of an Industry Network [J]. Organization Science, 1997, 8(2): 109-125.
- [8] 刘刚,王泽宇,程熙镭. “朋友圈”优势、内群体条件与互联网创业——基于整合社会认同与嵌入理论的新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2016,(8):110-126.
- [9] 边燕杰. 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J]. 中国社会科学,2004,(3):136-146.
- [10] Jiang H., Cannella A. A. J., Xia J., et al. Choose to Fight or Choose to Flee? A Network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 of Executive Ship Jumping in Declining Firm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7, 38(10): 2061-2079.
- [11] 南永清,臧旭恒,蔡海亚. 社会网络影响了农村居民消费吗[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9,(3):1-15.
- [12] Steier L., Greenwood R.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Evolution of Angel Financial Networks [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00, 21(1): 163-192.
- [13] Greve A., Salaff J. W. Social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hip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3, 28(1): 1-22.
- [14] 张新光. “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观[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 [15] Kaufmann D., Lindauer D. L. A Model of Income Transfers for the Urban Poor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86, 22(2): 337-350.
- [16] Huckman R. S., Staats B. R., Upton D. M. Team Familiarity, Role Experience, and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Indian Software Services [J]. Management Science, 2009, 55(1): 85-100.
- [17] Baron R. A., Ensley M. D. Opportunity Recognition as the Detection of Meaningful Patterns: Evidence From Comparisons of Novice and Experienced Entrepreneurs [J]. Management Science, 2006, 52(9): 1331-1344.
- [18] Davidson T., Sanyal P. Associational Participation and Network Expansion: Microcredit Self-Help Groups and Poor Women's Social Ties in Rural India [J]. Social Forces, 2017, 95(4): 1695-1724.
- [19] 费孝通. 重读《江村经济·序言》[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33-34.
- [20] Banerjee A. V., Duflo E. The Economic Lives of the Poor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7, 21(1): 141-168.
- [21] Baer M. The Strength-of-Weak-Ties Perspective on Creativity: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and Extension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0, 95(3): 592-601.
- [22] Brüderl J., Preisendörfer P. Network Support and the Success of Newly Founded Business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1998, 10(3): 213-225.

(责任编辑:巴红静)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0.08.009

[引用格式]杜江,王泽宇,解天骄. 相对贫困阶段农村贫困居民脱贫增收研究——基于本地和域外社会网络视角[J]. 财经问题研究,2020,(8):74-83.